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目标,妇女平等参与和性别主流化战略在实现此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妇女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决策者和受益者。将性别平等纳入碳达峰、碳中和实践主流,需将性别平等纳入所有相关政策与方案,并特别重视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性别统计,运用交叉性分析视角,发现不同女性人群和其他脆弱群体的不同需求。

碳达峰、碳中和实践中的妇女参与和性别主流化

李英桃

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威胁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联合国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目标13即为“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目标,而妇女平等参与和性别主流化战略在实现此目标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缔约方会议通过《巴黎协定》,确立了相比工业革命前控制全球升温不超过2℃并为1.5℃努力的全局长期目标。2018年10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中提出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的目标。为此,全球要尽早到达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即“碳达峰”,然后进入碳排放的下行通道;在2050年左右,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碳捕集与封存等形式,抵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即“碳中和”。截至2019年底,全球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碳达峰,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也有少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苏里南和不丹已实现碳中和目标,全球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碳中和作为重要战略目标。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20年12月12日举行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2021年“两会”期间批准的中国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也将“碳中和”放到了未来15年国家战略发展议程的重要地位。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技术和政策,还需要社会经济体系的全面深刻转型。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国际承诺和所采取的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展现出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反映了新时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标识了中国“能源革命”的阶段性目标。中国因此也成为全球低碳发展的践行者、创新者和引领者。

推动妇女参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与决策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步骤,而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则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之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议程的各个目标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在执行本议程过程中,必须有系统地顾及性别平等因素”“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将大大促进我们实现所有目标和具体目标”。正因如此,《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5个目标中包括“重点关注妇女、青年、地方社区和边缘化社区”。

在中国学术界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研究和倡导成果中,已开始涉及对妇女参与和性别平等议题的思考。例如,陈迎、巢清尘编著、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碳达峰、碳中和100问》中就专门设有一个问题:“女性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发挥什么作用?”书中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气候变化面前更加脆弱;第二,女性是维持家庭生计和保障生计安全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对应对本地气候与环境条件有更多的知识和理解,更能因地制宜地提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第三,中国留守女性人口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2/3左右,比男性更能感受到气候

变化的不利影响;第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应推动性别与气候变化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第五,从源头上鼓励和保障女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参与、贡献、决策和管理的权利,提高女性参与气候行动的意识,通过宣传培训加强能力建设,在促使女性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为她们争取更多发展机会。

毫无疑问,妇女是气候变化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应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决策者和受益者,她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

将性别平等纳入碳达峰、碳中和实践主流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也是节能减排和步入低碳生活的过程。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中国能源增量的主体,原有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体系也将发生变化。研究成果显示,在低碳能源体系中,不平等仍可以持续存在;新的能源体系可能并不比它们所取代的传统体系更公平、更包容、更公正。因为决定转型结果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是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和性别关系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能源体系转型的设计、目的、运用及其结果。如果不能切实落实性别主流化战略,妇女在劳动、经济、土地资源和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就不会因为低碳形式而发生根本改变。

《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中提到,对全球升温1.5℃的适应还可能不得不做出的权衡取舍或适应不良问题,从而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例如,一些适应项目可能由于设计或执行不善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和水的消耗,增加性别和社会不平等,损害人的健康,甚至危害自然生态系统。就性别平等而言,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纳入性别主流化战略,确保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资源和机会。

实施性别主流化战略,从空间来看,需要将性别平等纳入所有相关政策与方案;从时间

来看,要在做出决策之前进行性别分析;从结果限定来看,决策对男女两性应该有同等影响,两性也应该同等受益;从监督机制来看,性别平等观点要体现在从调研论证到方案确立,从形成决议到议案执行的决策全过程中。实施性别主流化战略,还需要特别重视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性别统计,尽可能多地设计性别统计对象,以清楚地掌握社会性别不平等领域、程度,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发展性别统计有助于反映社会生活中男女比较的客观情况;在决策领域,在推动更多妇女进入决策的同时,需着重培养领导者的社会性别意识;作为先进性性别文化传播者,大众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性别平等观念的角色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性别与教育水平、经济状况、职业选择、就业情况、生活地区及文化习俗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特定个人与群体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在将性别主流化战略纳入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进程时,需要同时运用交叉性分析视角,发现不同女性人群和其他脆弱群体的不同需求。例如,通过总结近年来中国农村逐步推广的“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能源项目,有研究者发现具体政策的设计、项目管理中对于当地农民具体需求的考虑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效果。所以,在投资具有适应力和气候韧性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考虑到女性和其他特定人群的特殊需要。

应对气候变化,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与实现性别平等,赋予妇女与女童权能,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性别平等意识,实现前者的努力,并不必然带来后者目标的实现;只有着力提高妇女参与水平,将性别视角纳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践的主流,两个目标方能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妇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女性发明人群体比例研究》

作者:吴红

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女性发明人在技术发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凸显,但是,女性发明人群体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传统文化束缚、女性接受工程技术的教育比例较低,以及女性本身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薪照护工作等因素制约了女性在技术发明中发挥更大作用。不过,现代社会中束缚女性从事发明活动的因素在逐渐减少,有利于女性发明的条件日趋增多,未来将有更多女性发明人投身于发明大军之中,与男性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1年第3期

《伴随性别转换的CEO变更与企业战略变革》

作者:许为宾 蹇亚兰 豆秋杰

基于性别社会建构理论,本文检验伴随性别转换的CEO变更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研究发现:异性继任者比同性继任者更容易导致企业发生战略变革;当继任者为异性时,相对于“女继男模式”“男继女模式”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继任者的异性效应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相对内部继任者,当继任者来自于企业外部时,继任者的异性效应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更显著。

来源:《财会通讯》2021年第11期

《当下都市女性题材剧的媒介社会学思考》

作者:宋超 白树亮 王维

近年来,都市女性题材剧不断涌上荧屏,催生一种推崇女性独立、自由、平等意识的电视剧叙事。本文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目前国内都市女性题材剧的热播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其在性别、阶层、消费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旨在反思都市女性题材剧存在的问题,以期推动该类剧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来源:《中国电视》2021年第6期

《妇女参与乡村振兴:制度困境与政策选择》

作者:黄快生

本文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妇女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与长效机制。第一,从思想文化动力、利益动力、治理动力出发,分析妇女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第二,从思想与战略阻力、环境阻力和政策阻力出发,分析妇女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阻力;第三,就妇女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能会产生的风险进行分析,如过度行政化、过度形式化和过度外部化等。

来源:《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4期

(素波 整理)

贴近生活百态,塑造多元化女性角色

——从《欢乐颂3》新“五美”争议谈起

刘洁

最近,电视剧《欢乐颂3》官宣演员阵容的消息发布,引起了对女演员外貌和角色的讨论,从中也可一窥当下的性别舆论生态。

美的争议:走出男性凝视

《欢乐颂3》引发的舆论一方面关乎外貌,如有标题称《<欢乐颂3>官宣新“五美”,一时分不清》,认为五位女演员美则美矣,但知识识别度不高。首先,“五美”的简称意味着女主角要美。然而今天,美的标准却十分单薄与片面,女性要皮肤白皙,要身材高挑,要有少女感,还要瘦到脱相……女演员苦男性凝视久矣。

“美”的含义同样经过了历史变迁。集体化时期以“劳动”作为审美中轴,对“美”的理解被认为是去性别化的。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的渗透伴随着性欲的张扬,“美”的定义一方面与身体高度相关,一方面受到男性审美的强烈控制。

作为男性支配的直观表达,男性凝视引发了女性的外貌焦虑。女性“爱美”本无可厚非,但在男性凝视下,却陷入一种“他人导向”的病态模式:别人怎么说、怎么认为和怎么做,也就是说,我认为和我做的标准,只有照葫芦画瓢,才觉得安心;而且,女性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这是今天多少女性对待容貌的态度写照!

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外貌焦虑从来不是简单地关乎仪容,外表还是女性获得认同和自

信的重要来源。在“为自己而活”包含了“为自己负责”的个体化时代,美与不美具有了道德色彩,美不仅仅意味着看起来好看,往往还意味着自律、自重、自爱等道德品质。一个人对容貌的不重视,被认为对其社会形象的不关注,这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她/他的评价。

不过,当有人反对对女演员的容貌进行“审判”时,也会有人以演员应当做好身材管理来加以辩驳。就此,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以无限度的男性凝视来扼杀更多美的可能性的观念与做法。

角色争议:如何呈现女性的百态人生

《欢乐颂3》引发的舆论另一方面关乎角色,如下所述:“消息一出,网友的关注点都在选角上,有人感叹这五人风格相似,‘没有人生活百态的感觉’,角色名也遭吐槽带着一股浓浓的‘玛丽苏风’,‘感觉不是普通阶层的剧’……”

这里提到了一个事实:在今天流行的影视作品中,“人生百态”总让位于“玛丽苏风”。的确,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太多不接地气的“甜宠



性别化处境。

“交叉性”是近年来性别社会学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流派。当网友敏锐地意识到《欢乐颂3》“不是普通阶层的剧”,也就是在说女性的处境其实是性别、阶层、年龄、城乡等变量交互作用的产物。以《欢乐颂1》中的“邱莹莹”角色为例,她就是性别和城乡两个因素所共同打造的形象,所以其在上海的打拼总是小心翼翼的,这既是女性的弱势使然,也与其“小城市”的出身有关;此外,“樊胜美”一角则体现出性别与阶层的协同作用,这两方面的处境决定了她的“被剥削”困境,阶层的低下使她不得不苦干和牺牲,女性的身份则让她遭到了家庭的无尽“蚕食”。

女性气质是规范的、具有导向性;偶尔也是工具性的,能够作为“工具箱”而任当事人选择。但是在男权制文化中,女性气质往往循着女性的生命历程划下一条既定的轨道:从青春期的清纯到结婚后的贤惠,从工作—家庭两头烧的无怨言到成为祖辈后的慈祥形象……

人生而有性,社会赋之以别。性别本质主义作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妨碍了对女性气质的多样化理解。学者董雪飞认为,女性气质的媒体形象乏善可陈,电影“局限于天使与魔鬼的二元框架”,将女性气质他者与刻板化,其“表征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表现模式”。相反,陈子豪则指出“中国影视剧塑造的女性形象多元且呈现类型化趋势”,女性气质包括:独立型、矛盾型、反叛型与平凡型。潘国美则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所拍摄的电影类型,将女性气质分为革命光环下的“硬派”女性、清新健康的运动女性影像和政治寓囿中的“妖女”群,认为这些角色“共同编织了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深层心理欲求的视觉体现”。

不同的女性角色拥有不同的女性气质。“飒”“御姐”“温柔”“知性”……都是女性气质的符号。无论如何,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只有不脱离现实,又不囿于成见,才会常青常新。显然,《欢乐颂3》新“五美”的争议不是起点,也不会是终点,但更多的性别维度的讨论才会让这样的争议有意义、有价值。

(作者单位:原科技社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